

□ 朱 薇

要求自己：“一丝一毫不能特殊”

和任弼时一起工作和生活过的人，都知道他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麻烦人；三怕用钱多。他经常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凡是能够过得去的，自己能够做得到的，决不要去麻烦组织和别的同志。

他生活朴素、严以律己。革命年代常常灰衣草鞋，30多岁的时候就被老百姓误认为50多岁。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平时，有关部门曾建议给书记处的同志每人做一套新衣服，以便参加入城阅兵式。任弼时不同意，他说：“我们是穿着这身衣服打天下的，也能穿着这身衣服进北平。”

一件用旧围巾的毛线翻织的背心，他一穿就是十多年；一条毯子从长征时期一直用到逝世。他经常提醒孩子们节约用电，并在每个房间电灯开关处写上“人走灯灭”的字样。他要求工作人员外出时要把需要办理的事情集中起来一次办完，因为这样可以减少用车次数，节省汽油。

任弼时从不允许生活上有半点特殊。他总是说：“凡事不能超过组织规定的制度，一丝一毫不能特殊！”刚进北平城时，后勤部门花了一点钱维修了住所的窗户。他知道后很不安，一晚上都睡不着觉。那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住所又紧邻着大街。党组织替他选了一个比较适宜的房子，建议他搬过去。他说：“那个房子驻着一个机关，而我是一个人，怎么能以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后来，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他知道后又拒绝了。一直到逝世，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

任弼时爱好广泛，多才多艺。他喜欢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他也擅长绘画，16岁时画的人物肖像就能和画馆师傅画得相媲美。革命年代他曾以画师的身份为掩护做党的秘密工作。他还爱好音乐，能弹钢

“党和人民的骆驼”任弼时

任弼时是我们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一生艰苦奋斗，勤恳奉献，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被誉为“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任弼时在树立优良家风、严格要求家人方面，堪称全党的表率。

琴、拉提琴，还能唱俄语歌曲。开国大典的那天晚上，任弼时和家人兴奋不已。他用钢琴伴奏，全家人一起唱起了《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咱们工人有力量》。欢快的歌声在小院里荡漾，直到深夜。

要求子女：“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里，任弼时与孩子们聚少离多，但却是他们眼中最和蔼的父亲和最负责的老师。只要孩子在身边，任弼时无论多忙都要尽量抽出晚饭后的一点点时间和他们一起散步，有时探讨学习和生活问题，有时讲讲革命故事和政治道理。他从来不在孩子们面前谈论自己的功劳地位和权力。当孩子们好奇地问他从事什么工作的，他笑着说：“我干一般工作，坐办公室。”他鼓励孩子们学习文化，鼓励他们锻炼身体，鼓励他们过朴素的生活。他常常说：“吃了人民的小米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

任弼时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他把子女的学习成才与国家民族的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很早就为他们定下了成长目标，那就是“成为于中国

建设有用的人才”。他曾为孩子们写下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小孩子要用心读书，现在不学，将来没用。”他时常询问孩子们进哪个班次，学哪些功课，有什么困难。他很关心孩子们在学校的表现和考试的成绩，希望他们开展竞赛。就连寒暑假，他也要督促孩子们制定学习计划，并叮嘱妻子设法组织落实。

任弼时注重培养孩子们自主学习的能力。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反复强调“读书主要在乎自己用心”“学习要靠自己努力”“善于利用一切时间求上进”。在学习方法上，任弼时又能耐心地给予具体的指导。他告诫女儿，国家建设需要科学知识，所以必须先学好数学、物理、化学，还要学通本国文并学会一门外国语。此外，还要多看报纸以增加政治常识。他帮助女儿学习俄文，帮助在苏联长大的小女儿学习中文。他还亲手为儿子写好大字模，每天为他画圈打份。

任弼时充分尊重孩子们自己的选择。任远芳是任弼时的小女儿，1岁零2个月时就和父母分离，独自生活在苏联伊凡诺沃国际儿童院。1950年任弼时在莫斯科治病，再次见到小女儿时她已经快12岁了。任弼时希望她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

家，然后再回国参加建设。但是任远芳向父亲提出了回国的请求。任弼时耐心地帮她分析了立刻回国和留在苏联学成后再回国两种选择的好处和坏处，接着明确表达了自己希望她“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的态度。但是，他也告诉女儿，“这一意见绝不是最后决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

任远芳最终选择了立刻回国。她插入一年级系统学习汉语，三年完成小学学业考上了初中，后来又考上高中，上了大学。这个与父亲共同生活总共不超过1年零7个月的孩子，深深地感受到“父亲的爱温暖了我一生”。

要求妻子：“同是党的儿女”

任弼时和陈琼英是“娃娃亲”。1926年，已是团中央总书记的任弼时把在袜厂当女工的陈琼英接到上海，举办了简朴的婚礼，从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任弼时帮助陈琼英学习文化，传授她工作经验，引导她走上革命的道路。陈琼英则是任弼时生活和工作上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

任弼时长期生活条件艰苦，工作

强度大，身体又很弱，陈琼英总是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在中央苏区时，陈琼英变卖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几件像样的衣服，换了些鸡蛋给任弼时增加营养。任弼时对陈琼英也很体贴，每当妻子外出归来时，只要有空，他一定亲自走到门外去迎接她。任弼时常常对陈琼英说：“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对党、对人民的爱情里的。”

1949年11月，任弼时的身体已经很差了。在苏联医生的建议下，经过党中央批准，他准备前往莫斯科治病。尽管苏联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但是面对糟糕的身体状况和尚不知归期的治病行程，如果能把妻子陈琼英带在身边，照料起居，聊天做伴，将是对他最大的安慰。

然而临行前，任弼时却主动提出了两条原则：一是随行人员宜少，家属一个也不带，译员不必配备，卫士也不需要，只需带上一名医生即可。他说：“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带的人多了，就要给国家增加负担。”二是添置服装力求节省。那时国家还没有对出国制装规定标准，但他有自己的原则，那就是尽量少花国家的钱。

在异国他乡独自治病、养病的半年多时间里，任弼时每天除了吃饭、

吃药之外，就只能遵医嘱躺在床上休息。因此，读写家信成为他念亲思亲、消解寂寞的唯一方式。在刚到莫斯科的大约三周内，他给北京的家人写了八封信，给在苏联学习生活的小女儿写了两封信。每次收信都使他“高兴而快乐极了”。每一封家信，他都要反复反复看上几遍，从字里行间中感受着亲人的爱意。

任弼时深深地牵挂着妻子陈琼英。他督促孩子们在周末和假期的时候多回家陪伴妈妈，为她排解寂寞，带来安慰；他告诫调皮的小儿子“必须听妈妈的话，听了妈妈的话才不会生病”，“才会进步得更快”；他关心着妻子的身体状况，询问她是否时常失眠；他惦记着妻子和孩子们的生日，琢磨着“当买点什么东西送给你们才是”。

任弼时去世后不久，陈琼英就把斯大林送给他的吉姆轿车以及他生前使用过的软床、钢琴统统交还国家，就连女儿骑的自行车也不例外。陈琼英一生从事党的机要工作，毛泽东曾称赞她“不为名，不为利，是革命的贤妻良母”。

党史人物

“进京赶考”的时代内涵

□ 李 芬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之际，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如今，68年过去了。虽然我们党已经带领全国人民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但是，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我们要全面把握“进京赶考”的时代内涵，在新的“赶考”征程中，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进京赶考”的使命意识

“进京赶考”的使命意识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艰辛探索的延续。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敌入侵及封建统治的腐败，中华民族遭受了百年苦难。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以百折不挠的精神，为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艰辛探索。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就将自己“目前的奋斗”目标确定为“建设国内和平”“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之后，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到“进京赶考”之时，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使命即将完成。然而，党的历史使命并没有终结，她还要为实现国家富强继续奋斗——“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进京赶考”的使命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心的延续。中国共产党刚成立，就表明自己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应该说，只要共产主义社会没有实现，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不会终结，就要一直为实现初心奋斗到底。

“进京赶考”的使命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汲取“李自成进北京”教训的延续。1944年3月，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认为该文指出李自成之败在于“进入北京后，忽略敌人，不讲政策，脱离

群众，妄杀干部，‘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实为明末农民革命留给我们的一大教训”。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人也要进北平了。毛泽东一再强调：“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

“不要退回来”的自我警醒

“不要退回来”的自我警醒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教训的深刻总结。明末李自成领导农民起义16年，马踏幽燕、定鼎京城，摧毁了大明，建立了“大顺”。然而，李自成仅在紫禁城待了42天就被“退回”了。疏离之间的王朝兴衰背后，有着其必然的规律——胜利面前的骄傲与麻痹。前车覆，后车诫。历史的教训启迪着中国共产党人只有时刻保持自我警醒，才能防止“被退回来”这样的历史悲剧在共产党人身上重演。

“不要退回来”的自我警醒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现实问题的清醒认识。西柏坡时期，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执政，长期过惯苦日子的党员干部能否继续保持革命时代的艰苦朴素、廉洁奉公，是党要极力应对和解决的问题。特别是，随着一些城市的解放，享乐、腐化、厌战的情绪一度在党内军内出现苗头；争夺公共房产或家具的有之，设立私人公馆的有之，取用家具或以家具赠人、搬入乡村的有之……直面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因此，中央提醒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决不当李自成”的执政自信

“决不当李自成”的执政自信源于人民的信任与支持。“最后的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的一尺布，送去做军

装；最后的老棉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含泪送战场”。这首感人至深的平山民谣，反映的正是西柏坡时期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无比信赖与支持。进京后不久，曾有人问毛泽东：共产党能胜利是肯定的，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胜利得会这样快，你们用的是什么妙计？毛泽东回答：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的支持就是最大的妙计！这也正是“进京赶考”前共产党人“决不当李自成”执政自信的根基所在。

“决不当李自成”的执政自信源于对未来发展的顶层设计。这主要体现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全会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经济、政治、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此外，全会还着重对全国执政后党的建设问题提出了新要求。可以说，七届二中全会所作的“顶层设计”，为中国共产党的全国执政从政治、思想、理论和政策上都做了充分准备，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决不当李自成”执政自信的底气所在。

“决不当李自成”的执政自信源于对党自身的信心。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成功经验时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其中，一个“这样的党”显然是核心要素。正是因为有一个“这样的党”，中国共产党人在“进京赶考”之际才可以豪迈地宣称：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我们相信，在新的“赶考”征程中，只要我们不忘使命，保持警醒，秉承自信，我们党一定能够在经受和将要经受的各种“考试”中，继续谱写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篇章！

党建视角

“三会一课”指的是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作为健全党的组织生活、严格党员管理、加强党员教育的重要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三会一课”历经起落沉浮而后砥砺前行。

“三会一课”的产生和初步确立

基于马列主义原则建立的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就建立了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组织体系。党的二大通过的党章对定期召开党小组、党支部、地方全体党员会议作出了规定。同时，领导干部讲党课也随着党的队伍建设需要而出现，比如1925年就创办了北方区委党校。古田会议前，毛泽东一直在思考如何“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从思想上建设党的队伍。古田会议上他总结出召开“小组会”“支部大会”“支部委、组联席会”等18种进行党性教育的方法。延安时期，处于艰难困苦中的中国共产党，创造出多种多样的党内教育办法。毛泽东高度重视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曾先后十多次到抗大授课。这些战争年代形成的优良传统，虽然未能形成一种稳定的制度结构，但其历经磨难的精神底色和实践成效，为“三会一课”制度夯实了根基，更注入了灵魂。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我们党成为全国范围的执政党，各地党员和党组织可以公开活动并加强他们的联系，“三会一课”自上而下推而广之。至1957年，包括新疆在内的大多数地方党组织都建立了生动活泼的“三会一课”，成为全党政治生活和组织生活的一种基本形式和基本制度。

“三会一课”一度中止后重焕生机

1958年发起的“大跃进”运动使党内良好的政治生活和制度环境遭到破坏。在1962年中央工作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严厉批评了当时“许多基层组织长期不开小组

会、不开支部大会、不上党课、党员不起作用”的现象。随后全面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让整个党内生活遭受重创。1977年2月，一封来自河北蔚县南双洞大队的信引起了《人民日报》编辑的重视。信中对“文化大革命”中几近瘫痪的支部组织生活忧心如焚：“有的单位长期不开党的支部会，不过组织生活，不上党课……这种状况应该马上改变。”《人民日报》果断地刊登了这封来信，在社会中引起反响，表达出当时大多数基层党员干部的心声。

与此同时，中央正在酝酿如何整顿混乱的党内政治生活。1980年2月，经过两年多酝酿、起草和征求意见，集中全党智慧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颁布。其中强调，要发扬党的优良传统，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组织，参加组织生活。1982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规定，设立委员会的基层组织定期召开党员大会、总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党员大会，以及组织开展党内学习教育。至此，一度荒废的“三会一课”在上下呼应中回归党内政治生活，为整治基层党组织涣散、重建党的统一权威发挥了积极作用。

十八大以来“三会一课”的新使命

一段时间以来，“三会一课”在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渐渐出现制度创新滞后、本质认识偏颇等问题。一些基层党组织“三会一课”呈现出僵化、空洞化、庸俗化的趋势，有的甚至脱离实际，出现“空对空、两张皮”。还有些基层党组织试图改变这种现状，结果矫枉过正，将“三会一课”变成工作述职会、经验总结会，失去了讲政治、讲党性这个精髓。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着眼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正本清源、净化政治生态，继续凝聚下一轮改革共识，成为党内各项制度的全新使命。2016年10月，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发布，将“三会一课”列为严格党的组织生

『三会一课』的历史沿革

□ 郝帅斌

活制度的重要事项，要求突出政治学习和教育，突出党性锻炼，强调要坚决防止表面化、形式化、娱乐化、庸俗化，坚持党员领导干部讲党课制度。这为“三会一课”这项具有深厚革命传统积淀的制度在当下的发展指出了重点，明确了方向，赋予了新的使命。而如何理解好、利用好“三会一课”等传统的党性教育手段，创新形式、释放优势，使之在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上再立新功，考验着当代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

史海拾贝